

近代西人在华博物馆的“在地化”尝试 ——以震旦博物院“中国药物展览会”为例*

The Change of Westerners' Museum Activities in China to Serve Chinese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Take the *China Pharmaceutical Exhibition* in the Aurora University Museum as an Example

蒋 凡

Jiang Fan

(浙大城市学院, 杭州, 310015)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内容提要: 震旦博物院在1942年4月12日举办的“中国药物展览会”是一个医药类主题的临时展览,是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社会影响力的科学普及展览。该展览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对医药需求的背景下,以震旦博物院的馆藏为基础,以震旦大学的研究力量为依托,通过专业且科学的方式组织展览,并辅以公开演讲和实验表演等社会教育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是当时同类型展览和临时展览中的代表。震旦博物院面向中国社会开办这一展览,也是当时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实现“在地化”转型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中国药物展览会” 震旦博物院 西人在华博物馆活动 在地化 博物馆史

Abstract: The *China Pharmaceutical Exhibition* held by the Aurora University Museum on April 12, 1942 was a temporary exhibition on the subject of medicine held in China. It was also 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hibition with great social influence at that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people's demand for medicine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exhibition wa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rora University Museum,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force of Aurora University, organized in a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way, supplemented by public speeches,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s and other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s. It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ame type of exhibition and temporary exhibition at that time. The exhibition held by the Aurora University Museum is an exhibition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it is also a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process of the loc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museums in China.

* 本文系博士后面面上资助项目“近代中国美术考古展览发展历史研究(1840—1949)”(项目批准号:2022M712801)的阶段性成果。

Key Words: *China Pharmaceutical Exhibition; Aurora University Museum; westerners' museum activities in China; localization; museum history*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以来,西方人在华博物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徐玲^[1]、吕烈丹^[2]、李军^[3-4]等学者的专著都对西方人在华建立博物馆的全貌进行过宏观概括,也有普加^[5]、戴丽娟^[6-7]、吕建昌^[8]等学者对其中个案进行了考察。然而,对建构这一历史全貌而言,现有对这类博物馆的个案研究还不够丰富,仍有开展深入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近代中国博物馆举办临时展览已较为普遍,但像震旦博物院举办的“中国药物展览会”获得社会热烈反响的临时展览却并不多见。该展览由震旦大学植物部门负责人生物学教授王兴义(Jacques Roi)和震旦大学医学院教授吴云瑞策划,展览设在震旦博物院三楼,“除每周二休假外,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五时开放”^[9]。展览于1942年4月12日开幕,原定于5月10日结束,但由于社会反响热烈,又延展至5月17日才结束。以中国医药为主题的展览能在当时获得如此好的社会反响,对中国博物馆史而言,这一展览的背景、内容和意义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

一、“中国药物展览会”的内容与社会反响

震旦博物院举办的“中国药物展览会”并非民国时期第一个关于这一主题的展览,早在1936年《申报》就曾有“中医药界发起组织药物展览会”^[10]的

报道,这个展会于上海杂粮公会场地举办,又被称之为“国药真伪展览会”^[11]。在1942年的重庆也曾举办过医药主题的“国产医疗药品器材展”,这个展览受到当时社会高层的重视,其中“蒋夫人(宋美龄)亦于27日上午亲往参观”^[12]。但上述两个展览内容的丰富程度和观众反响的热烈程度都远不及“中国药物展览会”。

1. 展览内容

关于这一展览的内容当时报道甚多,比如《申报》就有两篇报道介绍了这一展览。在展览开幕前的报道中简要介绍了展览内容。

内容分:一、中国道家炼丹药物(器具与矿产药物),二、中国贵重细药标本,三、中国药用植物,四、中国药用动物,五、肠胃病文献与标本,六、有关医学之各种书画文物,七、中国历代善本本草书籍,八、中华药典,九、民间药话,十、本草纲目,以及古本国外文献等。^[13]

在展览结束之后,由医学专家撰写的评论里提到:展览的布置“并不呆板,照本草的顺序排列下来”,第一部分是“中国道家炼丹药物”,“是具历史性的”;第二部分是“通常国药店所售之药”;第三部分是“科学审定有效药品”;第四部分则是医学以及药学图书展,“差不多都是平常图书馆见不到的”^[14]。

从这些报道看来“中国药物展览会”所呈现的内容是丰富的。当时有报道提到“从纵的方面讲,是一部中国药物历史;从横的方面讲,有药物与医理相互研究的价值”^[13],但从上述两篇新闻对该展览的报道,似乎难以发现纵横两项内在逻辑。在展览后,展览主持者王兴义和吴云瑞在《震旦医刊》上发表的报告说明了他们是如何组织这一展览的。

展览第一大部分为“道教及药用矿物”(表1),展览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因为中国古代道教认为“岩石及矿石既不腐化必能授吾人以不死之功效,彼等将丹砂雄黄及雌黄等物炼成各种丹丸,此乃道家炼丹之起源”^[15],以道家的用药作为

表1 “中国药物展览会”道教及药用矿物部分展品举例^[15]

类别	名称
矿石类	生银、丹砂、炉甘石、生铜、青琅玕、铜绿、铜矿石、黄铜矿石、自然铜、石榴子、灵磁石、禹粮石、粉锡、铅丹、烘晶银、易熔铅、铅粉
矽酸盐类	白石英、紫石英、玛瑙、云母、金蒙石、青蒙石、金精石、青石脂、木难珠、靛子、阳起石、猫精石、白石脂、滑石
盐质矿物类	宝砂石、靛子、蓬砂、刺子、方解石、石钟乳、滴乳石、花蕊石、桃花石、玄精石、绿松石、矾石、朴消
矿砂类	砒石、雌石、雄黄、锡齐脂、铅、无名异
可燃矿物类	金刚石、黑石脂、石油石

中国药物的起源，并以此专门设一展柜陈列“道教中之神像和炼丹用之岩石”^[15]，将此作为专门陈列还意在指出这些矿物有的已经应用于现代医学，比如“炉甘石及矾石可作收敛剂”^[15]，以此反证这些矿物确有药物的作用。

展览第二大部分为“药用植物”，这一部分是这一展览的重点内容。“药用植物”部分并非简单地陈列中国传统草药，而是通过西方化学研究的方式，展示被证实有医疗功效的药用植物。展览先追溯了中国药用植物化学研究的历史，“中国药用植物之化学研究开始甚早”^[15]，并展示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许植方教授对益母草和木防己的研究成果。其次展示的是入选法定药典的中国药物，以其作用分为八类，专设展柜陈列，并提出“中国古代医药界之药草并非可鄙视”^[15]。之后展示的是被列为成药的药草，这部分以吴云瑞本人对仙鹤草的研究成果和余岩对马齿苋的研究为主要的展示内容，以上述两种药草为例说明中国药草对当时社会的作用，比如在这一报告中提到仙鹤草“在现今欧美舶来货难来之际对于社会上定能作更多的贡献”^[15]。这部分展览最后是“药力之研究即药之生理研究”，重在展示药草研究的科研成果，展示了与肾上腺素

具有相似功效的麻黄素研究成果，淡竹叶、地黄等解热植物，并将能够治疗肠寄生虫的药草与肠虫标本专设展柜展示。

展览第三部分为“药用动物”，这部分以蝮蛇、蟾蜍、驴皮胶等为展示内容，通过西方人对中国药草中动物药的评价，说明这些药物的治疗作用。这部分“有鸟有兽有虫，排列的最为美观”^[16]。

展览的第四部分则展示了中国传统医药典籍、西方对中国医药典籍的翻译文本和关于中国植物的西文古书籍等，以此证实中国药草也为西方所接受的事实。

简而言之，“中国药物展览会”的组织逻辑是以中国矿物用药的道教起源开篇，对比展示西方科学对矿物用药的研究，进而引出现代化学研究对中国植物及动物药品研究的成果，并说明中国药物的医疗作用。整个展览以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反映中国药物的作用，在其中还通过模型说明某些药物的治疗机制。从这个展览的组织逻辑和展示方式看，这个展览以“引起国人研究兴趣”为目的，展览的组织兼顾科学性和历史性，体现了组织者认为中国古代医药“并非可鄙”的观点。

2. 社会反响

“中国药物展览会”作为一个“冷门的展览会”^[13]，却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在展览第一周，1942年4月18日《申报》报道“每日到会参观者约二三千人”^[9]。在此一周后，《申报》又报道“自开幕以来，颇得社会各界人士之注意，连日往参观者络绎于吕班路上，照该院第一星期之入门记录，已超过万人，可谓盛况空前”^[17]。为展览组织的配套活动同样“参加人士俱感极大兴趣”^[17]。在当月30日，《申报》继续报道“开幕迄今已及二周，各界人士对之颇感兴趣，上周间观众续有增加，团体学校皆联袂而往”^[18]。展览开办三周后依然深受社会



图1 参观“中国药物展览会”的观众络绎不绝

关注，“深得社会各界人士之兴趣，故观众至今不衰”^[19]。震旦博物院因此将展览的开放时间“增加一小时，自下午新钟一时三十分起至六时十五分为止”^[19]，而且还将“延长展览一周，至五月十七日为止”^[19]，其中最后一次演讲也是因此次延长而专门增设。不仅如此，“中国药物展览会”是一个收费展览，参观这个展览“均需购买参观券，每张计五角”^[19]，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个展览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观众，可见其社会反响之强烈（图1）^[20]。

自4月12日至5月17日，“中国药物展览会”共举办五周，若以每周超过万人的观众数量保守估计，这一展览约有5万人次以上的观众数量。当时上海另一著名博物馆——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在1940年全年大约有“六万五千人到馆参观”^[21]，这一展览的观众数量几乎赶上了上海博物院一年的观众数量。更何况观众人数“续有增加”，并且参加讲座和药理实验的观众数量并未计算其中。可见当时这一展览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二、“中国药物展览会” 获得成功的原因分析

“中国药物展览会”取得如此成功

的原因，在于其主办者对中国社会的关注。从展览举办的背景上看，这一展览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直面国内医药短缺的现实，向中国社会普及中医、提高国人对国药兴趣而进行的主题展览。从其展示方式上看，“中国药物展览会”内容专注于中国的传统医药，借助震旦博物院的馆藏和研究能力，使展览具有足够的深度；并且该展览还举办公开讲座、实验表演等配套活动，以助观众理解；该展览还将中国传统艺术融入其中，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上述这些方式，都是面向中国观众的服务。

1. 展览建立在对中医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中国药物展览会”组织者王兴义和吴云瑞两人都是中国药物方面的专家。王兴义是“震旦大学植物学教授，襄昔任职于天津市立博物馆”^[22]，“是植物专家，法国生物学博士，到中国来五年多，天天在研究中国的药用植物，对于中药已经著了几本书”^[23]；而吴云瑞是“震旦大学生理学教授”^[20]，他“对中国本草的研究将近六年”^[23]。他们所具有的研究能力，为“中国药物展览会”的开办提供了智力支持。

因此该展览受到了中国医药界的关注，王兴义在之后的采访中就提到该展览受到了来自诸如“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中华医史学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上海雷士德研究院”^[9]等许多学术团体和“著名国药号王大吉、宏仁堂、叶树德及普太和堂”^[9]等医药商家的支持，使展览内容非常丰富，展览得以“另向中国医药两界，临时征集者亦夥，故呈琳琅满目之致”^[20]。

2. 丰富的展览方式和配套活动

首先，从展览内容方面看，前文提及的1936年“国药真伪展览会”和1942年的“国产医疗药品器材展”作为临时展会都仅仅举办了几天，展期远不及“中国药物展览会”。“国产医疗药品器材展”尽管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却不及“中国药物展览会”这样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与“中国药物展览会”相比，这两个展览都没有以博物馆为依托，前者假借杂粮公会场地，后者则借用某一机构的“大礼堂”^[17]。展览的布置方面，上述二者也不及中国药物展览会，其中“国药真伪展览会”仅仅是药品的摆设，“各药品多盛于玻璃瓶中，均有标签，书明品名、产地，以及真伪价格之比较”^[11]。这些展示方式与“中国药物展览会”相比都不够丰富。

“中国药物展览会”作为向中国社会普及中国药物科学知

识的展览，意在引起国人对国药研究的兴趣，向参观者说明国药的价值。因此展览以“中国药物”为名，向国人展示现代科学研究下国药的医疗价值。为向观众阐述这些药品的功用，展览中运用了相关的模型加以说明，比如在展示治疗肠胃病药草的部分就使用了相关寄生虫的模型。不仅如此，为方便中国观众，这一展览中的“各类药物内均标有华文说明及治病作用，故参观者均能一目了然”^[20]。

这些与前述展览不同之处在于震旦博物院以其自身的收藏和积累，为这一展览的开办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与研究基础。震旦博物院以此开展的这一展览从国人的角度出发，将这些知识以国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加以展示，为中国社会服务是这一展览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其次，积极开展配套讲座与活动。震旦博物院为“为增加公众对于国药研究之兴趣”^[17]，还在震旦大学新厦一楼119号生理教室为这一展览组织了配套的“国产药品对于动物心脏之作用”“药理实验”等2次实验表演^[24]和5次专家讲座（表2）。由于这些活动都允许公众自由参加，这些实验表演和讲座吸引了许多观众。比如4月16日的“国产药品对于动物心脏之作用”

的实验表演就吸引了“医药界诸同仁及各学校学生计二百人之多”^[18]，而且展览的主持者王兴义认为这些实验如果有需要可以重复为观众表演，“如有愿意参观药理实验者，可用团体名义书面函约日期，再举行一次或二次”^[18]。

博物馆开展讲座在当时的上海并非新鲜事，比如在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早在1935年和1936年就由其馆长苏柯仁（Arthur Sowerby）举办过多期的博物馆讲座，苏柯仁当时还希望这个讲座能够“成为博物馆公共服务的一个常规特色项目”^[25]。但这些讲座并非专为该馆某一展览而设，而是以“博物馆收藏的标本为基础”^[25]开设的科学讲座。而“中国药物展览会”的讲座则是专为此展览而设，甚至5月17日的最后一次讲座就是由于展览延期专门举办的，并且这些讲座都围绕这次展览会的主题展开，从现有资料看，这种方式在现代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中似乎是仅有的一次。而该展览开展的面向社会公众的实验表演在当时更为少见。这些实验表演虽然仅举行了两场，但展览组织者提出了愿为感兴趣的团体再次表演的意向，这样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态度在当时也实属难得。不论是讲座还是实验表演，也都反映了这一展览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特征。

“中国药物展览会”还尝试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该展览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展览，主办者还在会场内使用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使之成为一个复合型展览。在展期中，由宋大仁在会场中主持“中国医药书画艺术展览会”^[22]。展出了“宋大仁及王吉民等医师珍藏关于中国医学之书画文物，并承文学家周瘦鹃出借其栽培之玲珑药用植物盆景”^[9]，将科学和中国古代艺术结合，使“中国药物展览会”成为一个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艺术结合的展览。加上之前提到的古代医药善本的展示，这些展品的加入使这个展览科学性和艺术性兼备，不仅可以引起参观者的兴趣，也是帮助观众理解展览目的的重要手段。这反映出“中国药物展览会”兼顾了中国药物背后的中国文化。展览以

表2 “中国药物展览会”专家演讲日程^[24]

时间	演讲者	头衔	主题
4月18日	王吉民	医史专家	《本草纲目》外译之考据
4月25日	刘永纯	博士，巴斯德研究院细菌部主任	巴斯德研究院对于中国药物之关系
5月2日	吴云瑞	震旦大学医学院教授	关于研究国药之雏见
5月10日	黄胜白	博士，医药专家	李时珍的声类学
5月17日	周梦白	药师	研究国药之一例

国药的道教起源开篇，说明该展览不仅将国药视为一种产品，同样重视国药背后的文化内涵。展览会中布置的“中国医药书画艺术展览会”则通过陈列国药相关书画和盆景等的展品，展示与国药相关的中国艺术。

三、西人在华博物馆 “在地化”的呈现

“中国药物展览会”举办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展览效果，就中国博物馆史而言，这一展览会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在华建立博物馆面向中国本土、服务中国社会的重要证据。震旦博物院所办展览表现出服务中国的意愿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欢迎，所以这一展览才能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吸引大量观众，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以“中国药物展览会”为代表，当时西方人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已具有面向中国、“在地化”转型的意识，并就此开展了具体的活动。

1. 震旦博物院——从“工具”到公共博物馆

“中国药物展览会”的主办单位震旦博物院，是从在华天主教会于1883年建立的徐家汇博物院发展而来，至20世纪30年代，徐家汇博物院从天主教会的直辖单位变成了当时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的附属机构。在此期间，震旦博物院是上海地区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徐家汇博物院在成立之初，其创办者意在将其作为在华专门的自然史研究机构。天主教入华后，为推动天主教在华的科学和文化传播工作，1872年8月，郎怀仁主教（Languillat）与江南代

牧区耶稣会会长谷振声（Agnello Della Corte）共同召开会议，决定在徐家汇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 du Kiang-Nan）”。此次会议决定由传教士韩伯禄（Pierre Marie Heude）“基于他的研究和收藏在徐家汇建立一个博物馆”^[26]，直到1883年徐家汇博物院最终落成。

徐家汇博物院的首任院长韩伯禄意在将徐家汇博物院建设为自然史研究的中心。据后任馆长郑璧尔（Octave Piel）记载，徐家汇博物院是一座单层建筑，拥有两个大厅，两间卧室，两间实验室，一个作坊和一个印刷处^[27]。而根据1920年出版的《上海指南》记载：“大门园地蓄活物一二种，楼下贮兽类及鸟兽之枯骨。楼上陈列，约分数种：如甲虫，贝介，兽类之皮骨，禽鸟蛇类是也，其中尤以皮骨一种为最多。”^[28]从上述记载来看，徐家汇博物院的内部空间更像是标本的储藏室而不是为展示设计的展厅。从徐家汇博物院的建馆动机中，也可看出其以研究为主的宗旨。在《震旦博物院史略》中曾提到：“该院最初的宗旨，原为著述发表，所以完全是注重在研究方面的。而主院者研究目标一定，就朝夕从事于一个部分，搜集材料，并加以研究，无复旁骛。”^[29]

以研究为主的宗旨在徐家汇博物院时期得到了贯彻，其自然史收藏也不断积累，到第三任馆长松梁材（Auguste Savio）时期，徐家汇博物院已经收藏有1000余件鸟类标本、1500余件长江流域鱼类标本及各类昆虫等的标本^[27]。经过几任馆长的经营，徐家汇博物院发展成为“一个研究人员满意的研究型博物馆”^[27]。可见，徐家汇博物院在建立之初更注重发挥博物馆的研究作用，它更多扮演了西方人在华建立的自然史研究基地的角色。就此而言，徐家汇博物院仅是西方自然史研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在当时仅与中国的研究人员联系密切，而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无太多联系。

随着徐家汇博物院藏品“物品之数渐增，徐汇旧舍已不敷应用”^[29]，“五十余年来所有搜集动植物标本已夥，徐汇院屋实有不足陈列之势”^[30]，建设新馆舍是徐家汇博物院向教会提出的新需求。

早在1916年，“法国总领事那齐亚（Naggiar）先生就与天主教传教士格里洛（Gilot）神父和震旦大学校长的姚缙唐一起制定了一项总体计划，计划在震旦校园内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天主教会就考虑将徐家汇博物院与当时的震旦大学结合起来”^[27]。将徐家汇博物院与震旦大学合并的提议在1916年后一直搁置。到了1929年，震旦大学校长

桑戴翰 (Lefelvre) 表达了“对徐家汇博物院的迁移和新馆舍建设的全力支持”^[27]。1930年4月26日, 徐家汇博物院新馆舍开始建设, 地址选在震旦学院北的吕班路223号, 为纪念徐家汇博物院的创办者韩伯禄, 校方将新的博物馆法文定名为“Musée Heude”, 中文则定名为“震旦博物院”。

1931年, 震旦博物院建设完成, 其建筑、展览和研究等方面与徐家汇博物院时期完全不同。震旦博物院“院舍做L字形, 计三层, 每层厅的总长度约八十公尺, 内分陈列室二间, 以及研究室, 实验室, 图书室, 摄影室等, 院舍指南, 另辟植物园一所”^[29]。震旦博物院最终于1933年重新开幕。震旦博物院的展览被分成了三个陈列室: 第一陈列室在地面层, 贮列古物, 系由土山湾育婴堂移来; 第二陈列室在二楼, 贮列动物标本; 第三陈列室在三楼, 藏植物标本^[31]。

由此可见, 与徐家汇博物院不同, 震旦博物院在创办时就将博物馆定位为“向公众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而且在馆舍设置上, 震旦博物院专门规划了三个陈列室, 这说明震旦博物院已经不再将研究作为其最主要的目的, 通过展览向公众服务成为了其重要的内容。

2. 西方人在华建立博物馆“在地化”转型的典型案列

在徐家汇博物院更名为震旦博物院后, 这座博物馆也开始承担起之前所不

被重视的社会责任。就展览本身的目的而言, “中国药物展览会”体现了它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想法。这一展览的举办是受当时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西药短缺的影响, 希望以此展览促进国人研究国药的兴趣, 这反映出震旦博物院已经有意针对中国社会举办展览。从震旦博物院的历史看, 该院自开办以来, 就曾组织过“历任馆长成就纪念展览”^[32]和“蝴蝶展览”^[33]等多个临时展览, 在“中国药物展览会”举办后, 还将“赓续举行昆虫展览会”^[13]。这说明举办临时展览是震旦博物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种向中国社会服务的转变是当时西方人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比如上文提到的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所建立的上海博物院同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博物馆讲座这样的社教活动, 通过博物馆向中国社会普及西方知识。

“中国药物展览会”是以震旦博物院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华建立博物馆, 从以研究为主到尝试“在地化”转变的典型案列。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从展览的观众数量和展览的组织方式等方面来看, 震旦博物院举办的“中国药物展览会”算得上是近代西方人在中国建设博物馆中, 举办得最成功的临时展览; 与当时同类型的其他展览相比, 不论展览时长还是社会效益, “中国药物展览会”也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 能够举办如此成功临时展览的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

这一展览还是当时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在地化”转型的典型案列。仅就震旦博物院来说, 如前文所述, 它的前身徐家汇博物院本是西方在华开设的自然史研究机构, 但在其转变为震旦博物院后, 通过举办临时展览等方式展现其对中国社会的关注。“中国药物展览会”作为这些临时展览中的一个, 在其组织目的、展览布置和社会教育活动等方面都围绕中国社会需求, 西方人已经不再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这一变化也反映出震旦博物院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中国“局外”的博物馆, 而是已经具有中国本土的博物馆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 徐玲. 博物馆与中国近代公共文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2] LU T L-D. 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 identiti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3] 李军. 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馆的两种类型——兼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J]. 东南文化, 2015(4): 98-106, 127-128.
- [4] 李军. 中国早期博物馆知识的传播——以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文报刊为例[J]. 博物馆学季刊, 2015(2): 5-21.
- [5] PUGA R M.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2(22): 575-586.
- [6] 戴丽娟. 在“边缘”建立“中心”——法国耶稣会士桑志华与天津北疆博物院[J]. 辅仁历史学报, 2009(24): 229-256.
- [7] 戴丽娟. 从徐家汇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J].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13(84-2): 329-385.
- [8] 吕建昌. 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上海徐家汇博物院创建年代质疑[M]//上海博物馆. 上海文博论丛: 2011. 4.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66-72, 5.
- [9] 佚名. 药物展览会讯[N]. 申报, 1942-04-18(5).
- [10] 佚名. 沪市药物展览会[N]. 申报, 1936-05-04(3).
- [11] 秀娟. 药物研究·国药真伪展览会纪略[J]. 卫生杂志, 1936(4).
- [12] 佚名. 国产医疗药器材展览延长一日[N]. 中央日报, 1942-04-28(1).
- [13] 佚名. 中国药物展览会[N]. 申报, 1942-04-10(3).
- [14] 刘粹公. 中国药物展览意义与感想(中)[N]. 申报, 1942-05-06(5).
- [15] 王兴义, 吴云端. 中国药物展览会之概况[J]. 震旦医刊, 1942(7).
- [16] 佚名. 西药涨价潮中举行中国药物展览[N]. 申报, 1942-04-05(5).
- [17] 佚名. 震旦博物院分实验表演与专家讲演[N]. 申报, 1942-04-24(2).
- [18] 佚名. 震旦药物展览二周记述[N]. 申报, 1942-04-30(5).
- [19] 佚名. 震旦药物展览日期展长[N]. 申报, 1942-05-09(4).
- [20] 佚名. 中国药物展览参观非常踊跃[N]. 中国商报, 1942-04-14(3).
- [21] 佚名. 药物展览参观盛况[N]. 申报, 1942-04-13(3).
- [22] 佚名. 中国药物展览会[N]. 政汇报, 1942-04-12(3).
- [23] 刘粹公. 中国药物展览意义与感想(上)[N]. 申报, 1942-05-04(4).
- [24] 佚名. 中国药物展览会近讯[J]. 上海医事周刊, 1942(08-05).
- [25] SOWERBY A. Proceedings, report of honorary director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for the year ending May 31, 1936[J].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6: pp.iv.
- [26] SERVIÈRE 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M]. 1915: 194.
- [27] PIEL O. Le 70e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uede 1868-1938[J]. 震旦杂志, 1939(38).
- [28] 佚名. 上海指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0: 68.
- [29] 佚名. 震旦博物院史略[J].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报, 1939(2).
- [30] 佚名. 震旦大学新建博物院行奠基礼志盛[J]. 圣教杂志, 1930(6).
- [31] 上海通社. 旧上海史料汇编(下)[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8: 64.
- [32] 佚名. 震旦博物院七十周年[J]. 科学新闻, 1939(23).
- [33] 佚名. 科学新闻: 震旦博物院[J]. 科学, 1941(25).